



SHIJ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理念的 风景

风 景

王 宝



季桂保 著

学人批评文丛

子六十年代

上海远东出版社

理念的风景

季桂保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殷卫星
装帧设计 王月琴

理念的风景

季桂保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161 插页 2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698-3 / G·582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天子我们这一代人 1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混乱的时代 9

- 一个充满意象的时代 11
- 经济发展必然是文化的福祉? 15
- 从大众文化到分众文化 18
- 米罗离我们究竟多远? 22
- 休闲 漫画 游戏 24
- 老爷子随笔与小女人散文 29
- “人文精神”讨论的命运 31
- 保卫语言 34
- 传媒时代的主张 37
- 匮乏与过剩 39
- “戏说”与历史的还原 41
- 骗子与傻子的合谋 44

思想与思想者	47
房龙的魅力	49
遗忘鲍德里亚	51
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牛顿	6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的立法者	75
默顿:中层理论的创立者	88
维特根斯坦:镜子·梯子·引子	102
理查·伯恩斯坦与新实用主义	108
 解释学与解构主义	 121
起源与目标	123
“两种文化”的困境	131
意义与理解	
——解释学哲学的本体论转向	135
游戏与对话	
——解释学哲学的原型	147
对话与解构	
——伽达默尔—德里达之争	158
解构主义在中国	163
 后记	 181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说清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把自己归入到整整一代人之中,似乎也并不能够减少这种言说的困难。从学理上讲,“代”首先是一种社会学用语,它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所作的划分。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得这种代际划分越来越接近于以 10 年为一个单元,有鉴于此,“我们这一代人”就首先指涉的是 6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差不多 10 年前,张永杰、程远忠合著的那本在文化界激起了不小反响的《第四代人》,就是

把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大学求学的一代学子同以“老三届”为主体、以“上山下乡”运动为历史标志的所谓“第三代人”加以比较参照，大致描述了 60 年代出生者的时代特征及其精神成长的历程，从而使“第四代人”的说法在社会上赢得了多少“同情之理解”！

10 年过去了，我们这一拨“第四代人”已经毕业离校，各奔东西，大家结婚生子或仍然选择独身，工作于国家机关或大学校园，做私营业主或外企白领，扮演着社会派定、父母期望或自己选择的种种角色，过着各不相同的日子；而所谓的“第四代人”的说法也便在这些日子的流逝中逐渐成为一种空洞的“能指”和遥远的声音。

因此，当我最初应邀参加同人的一次有关我们自身的对谈时，对于自己能够说清些什么便是颇感迟疑的。如今，这篇多人对谈已经以“散乱的一代”为题发表在 1997 年第 9 期的《萌芽》杂志上，而以“散乱”一词为我们这一代人进行言说，也实在表明了这种命名的内在困难。事实上，所谓“第四代人”、“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大学求学”等等说法仅仅具有年表学上的意义，殊难勾勒我们这一代人的全貌，而真正能够给予说明的，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总体的文化态度和“精神气质”(ethos)。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的扉页上曾经写下这样一句格言：“那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灭了。”这里所说的“那一代人”，也就是由共同经历造成的共同精神特征所加以标识和维系的。

从这种意义出发，我们的“散乱”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立场的杂乱纷呈和“精神气质”的一盘散沙。根本而言，我们的总体特征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就我们所经历的精神成长的过程而言，那种把自己的观念当作宇宙天体图并以此来

看待世界的做法已经显得有所不足，人们往往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至仅仅认识一件小事物。这是一个相对主义和多元论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使我们面对多重真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时能够表现出理智的宽容态度。时至今日，我依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有两本书可以看作是影响我们的文化态度和精神立场的具有意象意味的力量，一本是亨德里克·房龙的《宽容》，另一本是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在西方思潮热和文化热达致巅峰状态的 80 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未能像上述两本书那样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这本身就是极有意味的事。房龙使我们认识到，价值多元性和真理多元性并不是理论洞察力衰退的标志，而是一种道德设定。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以及种种专制行为才是真正的邪恶和社会的大敌。另一方面，卡西尔则教会了我们去寻找借助文化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当时在校的我们这一代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个世界，而我们理解世界的最主要的路径就是文化。我们把“文化”加以泛化和大化，对文化价值的关注似乎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的价值符号，以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事实上在做起买卖时，仍然不忘标榜一句：我们要多从事些文化产业。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大学求学”，这两个特殊的界定差不多储存着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共同经验的全部信息密码。无论从东西方哪种角度来看，本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都是当代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在生理上的出生成长以及精神上的成型，恰好成为这两个历史阶段的生动证明。我们刚刚开始咿呀学语，满世界就已经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震天口号；我们开始学习写字，练习的竟是“叛徒、工贼”和“批林批孔”；我们似乎天生地就

会在反面人物的名字上打叉，并且一眼就能认出电影中谁是苏修间谍，幼小稚嫩的心中似乎本能地埋藏着阶级仇民族恨；我们虽然没有上山下乡，但我们很小就学过工学过农学过解放军；我们没有做过“红卫兵”，但从“红小兵”到“少先队员”的历史演变却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当我们真正从书本上学到有用的知识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响彻云霄的时代。对于“第三代人”而言，他们亲身经历了一个狂热造神运动后，更愿意冷静地探求先哲留下的书本知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相信书本知识是后天获得的，而这种相信又是自觉自愿的。我们相信书本，连同相信书本上所告诉我们的各种知识、理论、概念、逻辑、语式乃至趣闻逸事。而正是对书本的迷恋，加上我们对文化价值的关注与对现实的忧虑以及我们青春年月的血性，我们的成长经历几乎同 80 年代所有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都息息相关。

我不知道把这些并不复杂的经历和经验陈说出来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在我看来，经历和经验首先都是个人性的，而即使在当今这样一个日益趋向多元化的时代，把个人性的经历和经验暴露于公共话语空间都会显得无甚意义和讨人嫌。然而，除了这些，我们还具有怎样丰富生动的生活历程呢？我们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经验而感到惭愧，同时又因此而感到自豪。

我至今对于自己能否被归到知识分子之列仍然不那么自信，这种不自信有时也使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今学术文化领域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表示过怀疑，比如，当我们这一代中的某个人被被誉为作家或评论家时，我往往便会对这样的说法表示质疑：评上了高级职称或取得了博士学位，就算完成了从莘莘学子向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型么？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凭借着自

己的智力条件进入到学术文化领域的。我们并没有私塾经历或家学渊源,即使我们的父辈同样身为知识中人学问中人,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也使那绵绵不断的学术薪火难以为继。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是按照伟大领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谆谆教诲成长起来的,到最后,我们当中的一拨人凭借智力和耐心进入了高等学府,并最终进入到学术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的学业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就我而言,10年复旦寒窗无疑是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经历,它从根本上塑造了我的知识背景、文化态度、行为规范乃至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复旦既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种文化语境,它最大限度地给了我们这一代学子以纪律、规范、自由和选择。强调文化与历史之重要性的人往往会说:“只要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能够说出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一说法实际上宣扬了人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一基本信条。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不断盛产的时期,以“第三代人”为主体的一代学人凭借他们对国学的重新领受以及对西学的全新诠释,对偏颇的陈见和旧语式发起了冲击,并试图从中确立起新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从而使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达到它应有的理论高度。在文化热长盛不衰的这一时期身处复旦这样的学术村落,即使不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敬、而仅仅是为了装装样子,都应该对新的理论、知识与文化保持一种虚心倾听的态度,而不应该将书本弃置一边。正是在这种文化热潮中,我们这一代人热衷于读原著、听讲座、相互讨论甚至创办一些并不怎么成熟的小刊小报,以此来表明我们对文化与知识的尊敬。

如上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更大程度上是凭借自己的智力进入学术文化领地的,这为我们获得一定的专业才能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除了必备的专业才能外，还应当具备坚定的道德信念和批判精神。由于没有亲身经历或参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的风雨岁月，我们这一代人与前几代人相比，在道德信念上显得更为简朴与单纯；而对世俗社会的种种要求和诱惑表现出独立的批判精神，同样也是道德信念的一种表征。在此方面，我们这一代人较多地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投合，比如，我们这一代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倾向于把专业同职业相等同，选择某一专业是为了到社会上寻找某种预期的职业，假若专业不对口，也要不惜代价重新返校改换专业门庭攻读硕士博士，因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而在以往，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树立“修齐治平”的志向。这种“道统”或“学统”如今则难以完全续接。其是否合理，恐怕应当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外去寻找原因。

刘小枫先生曾经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为题写就一篇传诵一时的美文。这是一篇有关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读后记；由于同特定历史时代的理想主义密切相联，巴乌斯托夫斯基在“第三代人”甚至更上一代人那里曾经激起了强烈的心灵共鸣，也使我们这一代人以虔诚的心态去加以领受。某一天，当我捧读刘小枫以该篇读后记为题的同名学术小品集时，一位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子丢给我这样一句：“这一代的怕和爱？还不就是爱钱，怕没钱！”一句话似乎“醍醐灌顶”。《金蔷薇》中有这样一段话：“儿孙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歌谣中涕泪横流地痛诉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由迷信的传说、神话、不敢吱声的胆怯的儿童们的眼睛和吓破了胆的姑娘们低垂的睫毛所点缀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时时都觉得可怖的神秘就近在咫尺——在森林中、湖泊中、朽烂的枯树中、老太婆的哭声中、用木板钉死了的弃屋中——时时都觉得奇迹就将

出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贫困。”这种“怕”，被“第三代人”读解为“为怕而怕”，而到了7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姑且称作“第五代人”）那里，则直接被理解为经济上的窘迫与生活上的压力。而我们这一代人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既有与上一代人相类似的形而上的关怀，又同下一代人一样敢于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暧昧的、摇摆不定的、夹缝中的。这样的态度，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处境。

我们这一代中的几个人不满于这种尴尬处境，以《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救世情怀》为题写成一书，一时走俏于大街小巷。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大程度上是一部怀旧之作（而不是对现实的记录）、是对“文化权势”的诉求（而不是拒斥）。所谓“权势”，按照美国人西尔克父子的说法具有如下的特征：“从一方面看，它们像是由许许多多人、建筑物、档案材料和契约组成的有形集团，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像是种种稍纵即逝的思想观念。”本文所说的“文化权势”，显然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差不多等同于时下流行的另一个术语，即“话语霸权”。《第四代人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这个社会，没有我们的身影也没有我们的声音，我们搭乘的是别人的车，也许我们在自由地生长，但只是一片次生林。是一次克隆。”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指的是“第三代人”，“克隆”的“原型”，主要也是指上一代人，因此，这种“影响的焦虑”，显然是针对“第三代人”所拥有的“话语霸权”而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大学教育，也直接表现为我们听上一代人讲王阳明讲鲁迅、讲海德格尔讲马尔克斯，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上一代人的灌输、传授、指导、鼓励和批评之下成长起来的（此处显然指的是精神成长），我们试图发出声音，就会表现为对某种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抗。

《第四代人的精神》一书还说：“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发言，甚至在我们或许可以发言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发言淹没。”如此的“激愤”似乎并不符合事实。如今，我们这一代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进入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大学等等机构部门的中坚阶层，正在取得某种“文化权势”或“话语霸权”——甚至《第四代人的精神》一书以某种商业化的包装方式得以出版，也是这种“文化权势”与“话语霸权”的表现，是我们这一代人“发言”的极好场所与机会。把这一种“发言”当做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声音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化潮流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分众文化”的现实，即除了某些文化产品与文化信息外，我们只会看到针对自己所属的分众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信息，而不会或没有兴趣关注和接触其他分众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信息。一种“分众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都已“散乱化”和“分众化”，都按照自己的特性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当今时代的幸运。也许，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将会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按照精神气质与文化趣味所形成的“分众”，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绚丽前景。

意象的时代

一个充满意象的时代

美国资深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除了撰有容量巨大的三卷本《美国人》以及影响深远的《发现者》外,还撰有一本取名为《形象》的重要著作,只是一直无缘捧读。据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教授介绍,这本重要著作所探讨的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形象,而是社会学对形象的研究,是对美国的“形象文化”所作的第一次分析,包括了对摄影、广告及传媒等等影响现代生活的诸种文化手段所作的分析。

读杰姆逊教授的介绍,同时便在揣摩“形象”一词是否就是 image 一词的对译。遍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一书,终于得到确证。在 1985 年的那次著名演讲中,杰姆逊教授从复制与现实这一关系出发,分析了“形象”的本质特征,并从萨特对现实和想象界所作的著名区分那里溯源到“形象”一词的哲学背景,继而还对“形象”与“摹本”(copy)和“类像”(simulacrum)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杰姆逊教授的结论是:“形象具有象征性,并不完全等于物质意义上的形象。”

这一结论很能使人产生一种“非分之想”:既然“形象”一词总是首先呈现出其物质意义,既然 image 一词“并不完全等于物质意义上的形象”,那么,用“形象”对译 image 是否仅仅只是一种理解上的可能?或者说,翻译和理解 image 一词是否还可能作

出其他一种努力(因为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解活动)?

当我读到另一位美国教授特威切尔所著《狂欢文化:美国的趣味粗鄙化》(哥伦比亚大学 1992 年版)一书时,确实对 image 一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该书开卷引用了小说家艾尔温·柏林在《安妮,拿起你的枪》一书中的一句名言:“娱乐业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该书总的基调是要对美国当代的娱乐业作出诊断,它涉及娱乐业所呈现和展示的种种 image,涉及制造和传输这些 image 的各种产业(包括新闻出版、动画片制作、影视业等等),还涉及为这些文化产业所吸引的如潮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以及对这一生产和传输过程始终加以关注并作出评说的文化批评家。

娱乐产品成为除军火之外美国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并且同军火具有同等威力,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美国人常说:“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去制造物体,我们美国人只从事展示。”护封套书、录像、CD 等等娱乐产品通过不断的制造和展示,使观众、听众和读者加入到娱乐文化的盛典中来;这些娱乐产品的生产者 and 传播者可能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展示的究竟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如何精确地计算其中的种种交换关系,诸如利润的盈亏、广告的价格等等,因此,通过不断地生产和传输,美国娱乐业确实使近几十年来人们的趣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威切尔教授进而把这种变化追究到当今社会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消费性的 images 上,认为美国娱乐业所要展示的,实际上也就是消费者所要看到的。

那么,什么是这些 image 呢?《狂欢文化》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列举:职业拳击赛、斯蒂芬·金、家庭购物网络、喜剧书籍、“儿弑父并食之”一类的醒目报纸标题、玛多娜身穿千疮百孔的衣裙演唱、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塑料制品、重金属音乐、肥皂剧、